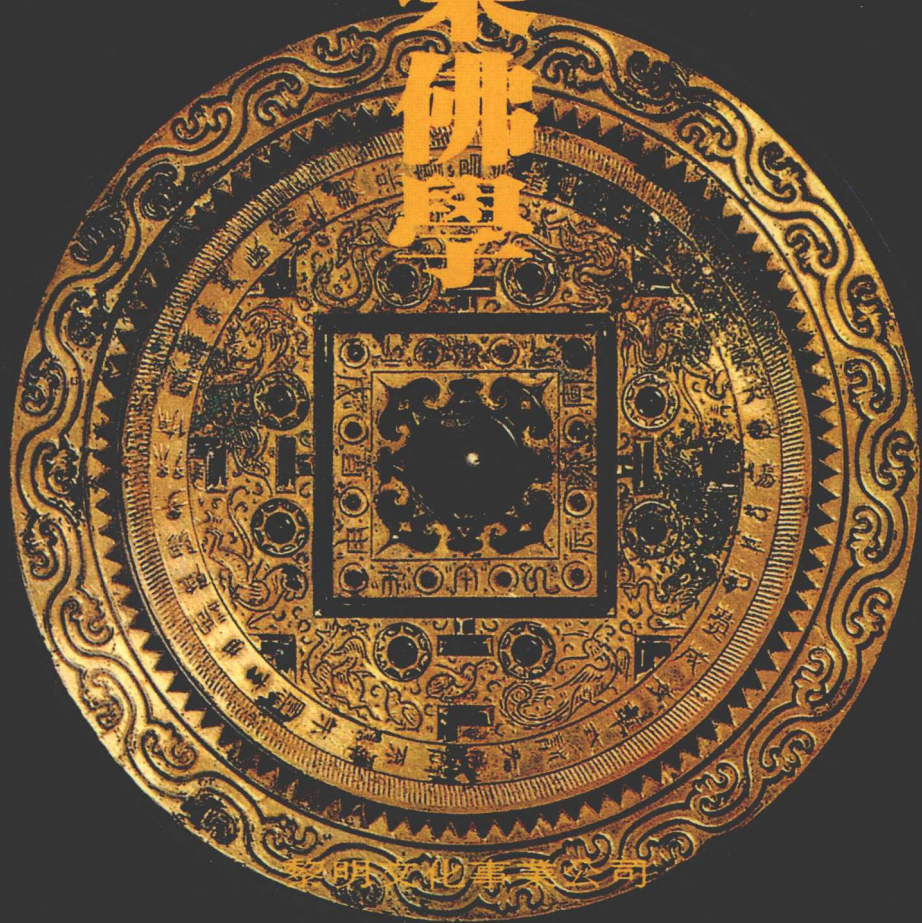




# 中國大乘佛學

方東美／著



中國大乘佛學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註冊商標

圖書目錄：120007（88-05）

---

## 中國大乘佛學

---

發行人：許明雄

著作者：方東美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二七八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三樓·電話／（02）23820613

發行組：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八二巷十九號·電話／（02）22252240

郵政劃撥帳戶：0018061-5號

臺北分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02）23116829

郵政劃撥帳戶：1373264-3號

臺中分公司：臺中市市府路三十九號·電話／（04）2201736

郵政劃撥帳戶：0286500-1號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左營區南大路4號·電話／（07）5871322

郵政劃撥帳戶：0044814-9號

總經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新店中正路542-7號6樓

電話：（02）82186018（代表號） 傳真：（02）82186013

印刷者：宥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五刷

定價：新臺幣（平）450元

---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ISBN：957-16-0112-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弁 言

本書係一代哲學大師方教授東美先生於民國六十三年九月至六十四年五月，在輔仁大學講授「中國大乘佛學」的錄音筆記，共二十一講。筆記初稿由任慶運、董策、楊士毅、談遠平諸先生負責記錄。校訂及分段附加標題之工作，則從第一講至第十講由傅佩榮先生負責，從第十一講至第二十一講由楊政河先生負責。

此一部講學筆記，以淺顯的口語表述深奧的佛學，並以中西印比較文化的觀點隨處闡發，毫無晦澀窒礙之感。治中國思想者往往苦於佛經典籍浩瀚，名相繁複，欲入無門，通過本書當可得一舒解。本書最後一講由於錄音效果欠佳，較不清晰。

民國廿七年間，方先生曾有一長函與熊子貞先生討論佛學，多有精闢意見，今作為附錄附於本書之後。

本書內容以原錄音為準，如有疏誤及所附加分段標題不妥之處，概由筆記及校訂者負責。

方東美先生全集編纂委員會謹識

# 中國大乘佛學 目錄

一	中國大乘佛學——引論	一
二	中國大乘佛學前奏——六家七宗	三五
三	僧肇三論	五九
四	道生的「佛性論」	一一五
五	中國大乘佛學——從佛經翻譯談起	一六一
六	中國大乘佛學——佛學從印度到中國的演變	一八七
七	天臺宗的判教方法	二一一
八	法相唯識宗的判教方法	二二七
九	華嚴宗的判教方法	二四三

十	三論宗的哲學	二五九
十一	研讀三論宗哲學所應具備的根本關鍵	三〇九
十二	從研究學問的方法看三論宗哲學論理之曲折與最後歸宿	三三九
十三	泛論三論宗的中道思想	三七一
十四	從分析哲學觀點評述三論宗與康德哲學、天臺宗、華嚴宗之異同	四〇五
十五	論天臺宗思想體系的特色	四四一
十六	涅槃經的思想特色與法華經安樂行義的要義	四七一
十七	闡述天臺哲學的一心三觀與六妙法門——可以解決顛倒離奇的當前難題	四九九
十八	研究天臺宗的思想步驟及對唯識宗應具有的認識	五三一
十九	從唯識宗的思想理路可解決西方存在主義的困惑問題	五六三
二十	研究唯識哲學的方法與步驟	五九七

二十一	研究唯識哲學的正確途徑	六三一
附錄	與熊子貞先生論佛學書	六五三
	「中國大乘佛學」參考書目舉要	六七五

# 一、中國大乘佛學——引論

## 一、佛教初至中國的情形

佛學從介紹到中國來，到現在已經將近兩千年了。但是佛學初介紹到中國時，不是直接從印度，而是從西域來的。那時所謂西域就是葱嶺以外，所謂大月氏、康居等地。後來從漢武帝一直到漢明帝開發西域，再漸漸從康居、大月氏、葱嶺這一帶傳到現在所謂的新疆，然後傳到甘肅、山西。這是從北路進來的。

到三國以後，再由海道從南方的吳傳入中國，但是那在最初只是微末的小事。

從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佛學初進來的時候，並不是純哲學，而多多少少是佛教之宗教的實際的行動。譬如像支婁迦讖、安世高這一類的人初到中國時，他除了傳佈佛教的教義之外，也多多少少拿一些法術帶引起來人們的興趣；但是那些東西究竟是宗教上面附帶的東西，而不是純粹的教義，或很高的哲理。

等到以後傳進來的佛學，才把小乘方面宗教的許多行動轉化過來，再着重在哲學方面的智慧。



那麼爲何要這麼做呢？因爲在中國文化裏面，從三代以來可以說，比較的是一種封建的社會，而在那個封建社會裏，從王侯、卿大夫到士……都是所謂貴族階級；而貴族階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所以當外來的宗教同中國接觸時，假使照佛教初進來的辦法，先打入下層社會，再逐漸向上面發展，而在上面發展時，知識階層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這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得見呢？從後漢書楚王英傳裏面可以看得見。佛教雖然是新來的，已經打到宮廷裏面，從士大夫的階級看起來，譬如像襄楷就寫信給楚王英說你提倡佛教，事實上，你不大有資格。士大夫階級連對王侯也不客氣，這樣子說。然後他把許多宗教的儀式，用當時一個怪名稱加上，叫作淫祠，這是不大好聽的名辭。

由此可以看出，假使外來的宗教要想從社會的下層逐漸提昇到社會的上層，這在別的文化裏面，可以。爲什麼呢？因爲別的文化，外來的宗教可以把它當作無人之境，就是把這個國家當作沒有文化的國家、野蠻民族，但是在中國卻不行。因爲世界上其他的民族還是野蠻時代時，中國這民族老早就達到很高的文化的階段了。

這一點，我舉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得出。在抗戰以前我們曾把中國古代的藝術品，像銅器、繪畫、雕刻、玉器等拿到英國去展覽，結果轟動一時。後來到了臺灣，故宮博物院再選出一部份藝術品到美國七個大城市巡迴展覽，而這與倫敦展覽相隔已經將近一、二十年了。所以許多歐洲人當時在倫敦看中國藝術品之後，就沒有機會再看了。結果這一次在紐約展覽，吸引了許多德國人。許多德國人來看了之

後，發表一個感想。他們說：中華民族在近古時代，甚至於在遠古時代，就能够在藝術的各方面有高度的發展。底下的那句話講得很有趣。他說：當中國人有這些驚人的藝術發展的時候，我們歐洲人還是畫了紅肚皮在森林裏面跑。這證明在中國老早進入高度的文明狀態的時候，歐洲人當時還是在森林裏面過生活的野蠻人。

佛教當初傳入中國是從西域，而不是從印度本土。西域是印度文化的外圍，這個外圍在紀元前二世紀到紀元後三世紀這個時期，大多還是半開化的民族。拿這個半開化的民族去接受印度古代高度的宗教文化，能力一定是有限的。

造成這種情況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希臘時代，馬其頓帝國的亞歷山大統一了希臘的城邦，然後東征。但是他東征並沒有透過蔥嶺、天山北路，而是走南路到達印度五河流域，這就把西方同東方的印度五河流域這一交通打開了。因此等到馬其頓帝國一衰下去之後，印度這種高度的文化就循了這個通路，經近代阿富汗，再向西北傳播。

而在中國這一方面，漢武帝開發西域是在亞歷山大東征以後將近兩百年，然後班超開發西域還要晚些。中國人開發西域走的是天山北路，那時印度思想已經由天山南路傳到了西域。然後中國開發西域，印度的佛教就循天山北路這一方面傳到新疆、甘肅、山西一帶，最後到達長安。

假使我們從佛教初進中國的歷史來看，像他們這樣慢慢向上發展，要等好幾個世紀中國人才能接受外來的佛教，而佛教也要經過很長久的時間才可以在中國人的心靈裏面生根。

這一點對於宗教的傳播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因為許多宗教本身有高度的發展，但是在傳播到別的國家與社會時，它往往以別的國家與社會為文化的真空，或者是文化的落後區域。譬如像近代希伯來宗教或者是基督教，假使到非洲去發展，可以採取這個態度；到南美洲山區裏面去發展，也可以採這個態度。但是假使拿同樣的態度，到東方來，到中國來了呢？我想一定要遭遇到佛教初進中國的時候所遭遇的同樣態度。為什麼呢？因為它必須從下層社會逐漸向上超昇，中間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冤枉路。

譬如在清代，西方的基督教進到中國社會來，遇到許許多多的阻力。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傳教士本身沒有多大學問，然後他把中國當作文化沙漠。這樣一來，知識階層馬上就起來抗議。要是由下層再超昇到上層階級裏面去，不太容易產生效果。

所以在這一點看來，所謂的公教（天主教）就比較聰明了。譬如公教裏的耶穌會，他們的會士在未到東方以前，本身就具備西方的哲學訓練及宗教修養，可以說是學問的人。所以耶穌會同中國的接觸，尤其在明代，他們並不是從下層社會向上層傳教，而是驟來就打進到明代的宮廷。可惜他來晚了一步，因為當時的明代已經衰敗，馬上就要亡了，所以他們只能夠同少數的士大夫階級接觸。結果明末的知識份子開始不是接觸西方的宗教，而是接觸西方的科學，或者是西方的哲學傳統。這樣一來，雖然晚明不久就亡了，但是他們已經打進晚明的知識階層裏去了。

當時許多耶穌會士一方面是一個媒介，把西方的科學、西方的宗教、乃至於西方的哲學向東方傳播；而同時，因為他本身的學養很高，又能夠接受中國的古典的文化，因此，有許許多多的中國經典透

過拉丁文的媒介，傳到西方去了。

至於有些新教徒，他自己本身在宗教的訓練、科學的訓練方面素養要差一點，所以到中國時，一進來就格格不入。這是因為他的態度不對，以為他把那個宗教傳播到中國來，好像傳播到非洲，傳播到南美洲一樣。這是他們根本的錯誤！所以有人曾經說，假使這些新教徒當初要請嚴又陵把新約聖經翻譯成很好的文言，那麼在宗教的傳播上，恐怕效果要遠遠超過拿生硬的白話文去翻譯。那種白話文甚至不是中國習慣用的，像唐代禪宗所用的語錄，或者宋代理學家所用的白話文，甚至還不够那個標準。這樣一來，士大夫拿到那個翻譯，覺得不是中國話，根本不是中國的章句筆法。所以這種文字對於漁民、對於農夫、對於漢口一帶船夫，可以產生效果；但是在知識階級裏面，所得到的反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拿中國話來說，叫做「言之不文，傳之不久」，也傳之不遠。

因此我覺得，佛教在中國所以能够生根，就是當它進到中國時，一比較之下馬上就發現從西域傳來的佛教思想，是從印度傳到西域之間的資料，而西域的民族文化和中國關內的高度文化簡直不能比。因此中國士大夫就說了，這種東西是淫祠，他看不入眼。所以再經過一個時期，佛教就改變方式了。那個時候，從大月氏來的人，譬如支婁迦讖，姓支，為什麼姓支呢？因為他是從月氏來的。譬如晉代的支遁、支道林，祖先也是月氏來的。再像康僧會，雖然姓康，卻是從西域的康居來的。以國為氏。他們一到中國來，假使想在中國生根的話，首先須接受中國的教育，尤其是文字教育，然後他本身變成中國知識階層中的一份子。其次第二步，再把他的宗教信仰，藉中文傳譯出來。這樣一來，從後漢到魏黃初、

正始時代，然後到西晉，中國士大夫階級曉得從外面傳來的資料不可靠，是間接資料。所以中國人中傳佛教的人像朱士行，馬上就帶了一批人西行求經，這是因為從西域傳進來的間接資料不能夠滿足中國人，所以中國人自己開始西行求經。

## 二、中國本有高度的文化

那個時候天山北路自從漢武帝、漢明帝以來，已經開通了，所以他正好走天山北路。他所謂西行，不是到西域，而是透過葱嶺之後，再折到那時候所謂的罽賓——罽賓就是近代喀什米爾這一帶。從喀什米爾再到達五河流域、恆河流域。

從朱士行這一類的人開始以後，引起了法顯，法顯又引起了玄奘，玄奘再引起義淨，一大批中國知識份子，到印度去直接求經。由於中國人去的是高級知識份子，所以到印度就認識了許多佛教的大宗師，譬如東晉時代的鳩摩羅什，稍後的覺賢（佛跋跋陀羅），再引起以後許許多多的印度空宗、有宗的大師，接二連三到中國來。從東晉到六朝合併起來，有好幾百人之多。

這些高僧到中國來，以鳩摩羅什爲例，他未入長安，先到龜茲，一到了中國馬上就學中文，在龜茲住了好多年，然後姚秦把他接到長安來。鳩摩羅什幾個大弟子像僧叡、僧肇，寫中文都是拿莊子的筆法來表達思想的。鳩摩羅什對他的學生僧叡或者是僧肇講：我對中國思想之瞭解、對於中國文字的運用，

僅次於你們兩個人。我們知道僧肇的肇論裏面文字非常之美，而鳩摩羅什以一個從西域來的佛學家，學中國文字，研究中國道家思想以後，他自認他的造詣僅僅在僧肇之下，幾乎不作第二人想。

我們由此可以看見這位從印度來的大佛學家的心。他瞭解在兩種文化接觸的時候，不僅表現物質上的接觸，更應當表現心靈上的接觸，而且是最高級的心靈接觸。

鳩摩羅什在長安建立了佛教的翻譯中心，他門下弟子幾千人，彷彿是一個大磁石吸了許多小磁石，小磁石再吸了更多的小磁石。這樣一來，真正的印度學者到了中國，中國也派遣很有學問的人去迎接他。然後雙方面的文化就在高度的智慧上產生直接接觸。

我們由此可以明瞭，宗教是不能盲目傳播的；盲目傳播不會產生效果。一定要有高度的學問修養、很高度的智慧、很高度的心靈狀態，才能產生密切的心靈接觸。這一點尤其是在中國社會，因為中國社會從商、周以來，在封建社會裏面掌握政權的都是知識階層。這條路如果打不通，一定要產生許多莫須有的阻力。

現在就這一點看起來，近代有許多人產生一種誤解。

在過去一年裏，我講過儒家哲學與道家老莊的哲學。中國的先秦時代不像漢代——所謂學術只有一尊，只是儒家孔孟的哲學。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社會是開放的社會。只要一種思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它都可以在學術界成爲韓非子所謂的「顯學」。先秦的哲學，譬如老子、莊子、孔子、孟子、荀子，這是道家與儒學的顯學。還有墨子，也是一種顯學。甚至法家，也是先秦時代的顯學。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借用近代德國哲學家雅士培(Jaspers)的觀點，他認為，綜觀整個人類社會，包括古代的希臘、埃及、東方的印度、中國的華夏民族，可以說在紀元前第六世紀，或者再長一點，可以從紀元前八、七世紀一直發展到第六世紀，他曾經用了一個名辭叫作「軸心時代」。這不是納粹在二次大戰時結合德、意、日的軸心，不是那個意思。這所謂軸心時代是指古代西方的希臘、南方的埃及、東方的印度與遠東的中國，這幾種高度發展的文化民族，同時之間好像把神宮寶盒打開來，第一流的神奇人物，統統出現了。譬如希臘後期的自然哲學家、數學家以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等哲學家，希臘文學中的悲劇詩人，好像統統一齊在希臘出現。同時埃及方面，從舊王朝轉變到新王朝，在宗教上面有許多寶典出來了；而在藝術上面，有許多雕刻、建築、繪畫，表現出來。在印度方面，像四吠陀、奧義書，一直到數論派的哲學、大小乘的佛學，也在這個時期出來了。而在中國，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等大哲也都先後出現了。

從整個世界歷史看起來，還沒有哪一個時代可以拿來同人類在紀元前六世紀的時代相比，當時各方面的天才都湧現出來，形成各民族裏面最高度的文化精神成就。以後的人類還沒有第二個時期，像那一時代在希臘、埃及、印度、中國，有那麼光輝燦爛的高度的文化同高度的哲學，同時出現。

因此，在佛教介紹到中國以前，中國早已經有高度的文化了，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都有高度成就。井田制度形成完備的經濟社會；至於在封建制度裏面，雖然開始是一個神權政治，但是政治上的領袖，像堯、舜、禹、湯、文、武，都是天才，而這些天才都有特殊的能力。用德國瑪克司·韋伯(Max

Weber) 的名辭來說，這些神權政治時代的天子，每一個人都有神秘的智慧，都有「天縱之聖」的高度精神智慧，這樣才可以像所謂「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拿他的智慧去瞭解人民的心理的要求，然後再制定經濟的制度、政治的制度、社會的制度，來領導他所統治的人民，形成高度的文化。

一直等到春秋時代，貴族的封建社會漸漸破滅，於是知識階級的下層，所謂士就起來，把古代貴族封建社會裏的高度的文化承受了。然後像儒家，孔子採取「有教無類」的辦法，就把古代的智慧傳播到社會中比較低的層次。然後再把古代所謂「氓」，就是只曉得「飢求食，渴求飲」的低級的民眾，再用有教無類的教育方法，把他轉化了成爲與古代貴族有同樣的精神修養，有同樣的高度智慧。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產生了儒家的孔、孟、荀，道家的老莊，然後是墨家的墨子同別墨，乃至於政治方面的法家等，許多顯學都出來了。

那麼，我爲什麼提到這種事體呢？因爲從佛學傳到中國來之後，現代許多人回顧這段史實，就提出不同的說法。

一種是西洋所謂的「中國通」，事實上是中國不通，因爲有許多文字的隔閡及文化的隔閡，使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演變、發展，並不明瞭歷史的內在的情形，而是拿西方學者的一種偏見來看，那麼這種偏見怎麼形成的呢？



### 三、避免錯誤的歷史觀念

我平常說，西方歷史上有一個主要的觀念，這個主要的觀念多多少少與希伯來的宗教有關係。譬如希伯來的宗教講末世論，然後再看歷史，那麼這歷史就要指出：在宗教的教主還沒產生以前，人類是苦惱的、是黑暗的、是陷於罪惡的。等到一個大教主出來了，顯現他的精神感召力，才把許多人從黑暗、痛苦、災難之中引到一條路上面，那就是人類的歸宿。在西方講宗教、講末世論，就是說，從黑暗、痛苦、災難出發，產生一個精神的歷程，指點一條人類的歸宿，然後這樣才可以到達高尚的精神領域，像天國，把黑暗化作光明、把災難化作幸福的歷史進程，我平常叫作「歷史的直線進程」。

「現在」，在歷史的直線進程裏面，原是一個中性的狀態。但是從近代天文學的演變，尤其是近代生物學的演變看來，一切發展的程序並不從時間本身來着想，而是把時間觀念化成空間觀念來設想。

譬如西洋的歷史進程是一條線向前發展的。但是我們要問一條線時間的構造是如何？它本身不能加以說明。假使我們把時間化成段落，段落化成構造單位，構造單位化成時點，這樣一來，就馬上把時間的概念引到幾何學裏面去了：把它化成一條線，而一條線的構成是點與點銜接構成的。

但是點與點結合起來，能不能構成一條線呢？這在歐幾里得的幾何上有極大的困難。因為線的構造是一個連續的結構，假使把一條線根據幾何學上歐幾里得的構成原理看起來，一定要把線化成線的段